

回望桐城派

“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，保疆土而安黎庶，不在一身之荣辱也。”(姚莹《再与方植之书》)在致友人书中，姚莹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，殷殷报国之心，无论是治理地方，抗击外敌，还是著文醒世，皆终身践行。

姚莹(1785—1852)，字石甫，号明叔，晚号展和、幸翁，清代桐城人。为桐城派重要作家，抗英名臣，亦是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。

抗英保台 五战五捷

道光十八年(1838)，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，加按察使衔，官秩正三品，成为当时台湾最高行政长官。

道光二十年，鸦片战争爆发。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侵略者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堪一击，大陆沿海要地纷纷沦陷，这时孤悬海外的宝岛台湾便成为英军觊觎已久的重要目标。姚莹对此早有思想准备，他给友人梅曾亮的书信中说：“畏葸者固非，而轻敌者亦未为是。”“莹职在守土，惟知守土而已，不敢他及也。”(姚莹《复梅伯言书》)此后三年间，姚莹率领台湾军民积极备战，在鹿耳门港等海域阻击来犯英军，五战五捷。在没有一兵一卒外援的情况下，孤岛台湾独树一帜，未丢一寸土地。

其中比较重要的战斗有三：其一，一战鹿耳门。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六日，英军首次侵犯台湾，一艘双桅船行至鹿耳门外海面。姚莹与台湾

姚莹的爱国情怀

汪传荣

总兵达洪阿立即下令封港口，派水师船阻截，驱离敌船。之后双方相互炮击，最终夷船败逃。这是台湾军民抗击英军的首次胜利。其二，激战基隆港。次年八月，英船“纳尔布达”(Nerbudda)号入侵基隆港，炮轰二沙湾炮台。姚莹等率领港口守军奋勇还击，击退敌船，歼敌32人，生俘133人，缴获大炮10门，并获英文图书等诸多战利品。其三，智战大安港。道光二十二年正月，英船阿纳(Ann)号入侵淡水、新化交界的大安港。姚莹、达洪阿部署兵勇埋伏于港口，设计诱使敌船进入港口，搁浅于浅水区。在岸上军民猛烈炮火下，敌船破损，夷人被杀、淹毙者无算，生擒54人，缴炮10门等大量战利品。

基层治理 精准施策

“为政在乎得民，而得民者，必与民同好恶。”(姚莹《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》)姚莹于嘉庆十三年(1808)中进士后，进入两广总督百龄等人幕府，嘉庆二十一年始任福建平和县令，至咸丰二年(1852)卒于湖南按察史任上，四十余年间遍历粤闽江浙台川等地，以通晓民情为先，以解决民生疾苦为重，通过恩威并用、除弊兴利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，加强了地方管理，缓和了社会矛盾，曾被闽浙

总督董教增称为“闽吏第一”(姚莹《董文恪公》)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嘉庆二十二年，姚莹任福建龙溪县令，针对当地盗贼肆行、械斗仇杀殆无虚日现状，实施“恤族守社”之法，由各族公出费用，组织本族中赤贫无业青壮年，训练成护族守庄的壮丁，社会治安迅速好转。

后来，任台湾道期间，姚莹实行“联庄养良”之策，将各族无业游民组织训练成团勇，既稳定了地方，又为后来抗英保台储备了军事力量。

开眼世界 著文醒世

姚莹是姚鼐(桐城派“三祖”之一)的侄孙和受业者，与方东树、管同、梅曾亮并称“姚门四杰”。同时，姚莹与陶澍、林则徐、魏源等同为晚清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面对晚清社会危机，姚莹等一批爱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学术与治理思想之不足，积极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新观念，谋求救国图强良方。姚莹一边以敏锐洞察力，关注民生疾苦，重视边海安全，同时，潜心研读《西域闻见录》等记述西方的书籍，融汇时人放眼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与全新知识，形成了整体的世界史观，这为其研究边疆史地，撰写重要著作《东槎纪略》《康

輶纪行》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道光九年，姚莹完成撰写《东槎纪略》，内容涵盖台湾地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山川道里、风俗民情等，为后人治理台湾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。清代诗人吴德旋作序云：“后之从事台湾者，必取其言以为鉴。”

“台湾之狱”以后，姚莹被贬四川，两度奉使西藏乍雅(今察雅)，写就了体现其爱国经世思想的又一力作——《康輶纪行》。书中既有康藏地区山川形势、边疆沿革、风物民情等内容，也有对廓尔喀(尼泊尔)、印度、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边地的考察研究，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不满足于占领印度等国，一直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。《康輶纪行》与魏源《海国图志》等书籍均开拓了国人眼界，对于近代中国具有思想启蒙意义。



汪传荣，桐城市博物馆副研究员，多年致力于桐城历史文化的学习与挖掘

回望桐城派

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，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为“桐城派三祖”。它在当时文坛的深远影响，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：“有清一代的古文，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。在‘桐城派’未立以前的古文家，大都可视为‘桐城派’的前驱；在‘桐城派’方立或既立的时候，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，又都是‘桐城派’之羽翼与支流。由清代的文学史言，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，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。”由此可见桐城派之兴盛景象。



方宁胜，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，著有《桐城科举》，参与编撰《桐城文派史》等各类著作20余部

桐城派与湘乡派

方宁胜

然而，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之日，桐城派亦然。当它传至姚鼐弟子之时，门庭盛大之中隐含衰颓危机。及至姚门杰出弟子相继谢世，其势益衰。近代以降，内忧外患日益加剧，形成于康乾盛世的桐城派，内部传衍既久，创造活力减弱。当此之际，亟需有人挺身而出，拯时济世，挽救危局；同时，发挥文学经世的功能，发雄豪排困之歌，振起桐城文脉。这一双重任务，历史地落到了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身上。

与先前的桐城派作家不同，曾国藩并非纯粹的文人，而是集文学与事功于一身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他天性好文，早年立志以治古文为业，不断求索。当他接触到桐城古文后，即细心揣摩，奉为正宗，对姚鼐更是十分敬佩，自言：“国藩之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启之。”在京师为官时，曾向桐城戴钧衡询问古文之法，戴氏授以姚鼐《惜抱轩尺牍》，自此“精研文事”，颇有所心得。又向姚门高足梅曾亮请教为文之道，执礼甚恭，而“梅、曾二家宾客相通流。”曾国藩则以其通儒之学，体用兼备，名重一时。

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，曾国藩组建湘军，与之相抗，并于咸丰三年(1853)开幕取士，招揽天下英才，为

其辅佐，其中不乏能文之士。治军之暇，他常与其幕僚论道问学，切磋诗文，在他的身边，聚集了一大批古文名家，其中以武昌张裕钊、桐城吴汝纶、无锡薛福成、遵义黎庶昌最为杰出，号称“曾门四弟子”。此外，郭嵩焘、吴敏树、刘蓉、莫友芝、孙衣言、方宗诚、吴嘉宾等亦以古文著名。一时间，幕府内外，交相呼应，风气鼓动，如异军突起，彬彬称盛。其文章面目，较桐城派前期呈现别样光彩。晚清学者李详著《论桐城派》一文，称“文正(曾国藩)之文，虽从姬传(姚鼐)入手，后益探源扬、马，专宗退之，奇偶错综，而偶多于奇，复字单义，杂厕相间，厚集其气，使声采炳焕，而戛焉有声，此文正自为一派，可名为‘湘乡派’”。

所谓“湘乡派”，虽以其领袖人物曾国藩籍贯定名，但主要作家除湖湘人士外，更多来自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安徽、贵州等省，他们的身份皆为曾氏幕客门人，且服膺桐城古文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桐城派呈现中兴之势，而曾国藩俨然成为桐城派中兴的主将，其《欧阳生文集序》表明，他确有自开新局、别立门户的雄心。据此，不少学者认为，湘乡文章别异桐城，能够自成一派。然而，从文学自

身发展过程看，将湘乡派与桐城派视为一个整体似乎较为恰当，或者说，湘乡派是桐城派在近代的新变与发展，亦可视为桐城派的别支。二者的文论主张与文章风貌同中有异，各具特色。在学术思想上，二者都以宋学为宗，视程朱理学为“正学”；曾国藩赞成姚鼐“义理、考证、辞章”兼长相济说，更重视个人的“器识”与“事业”，故特意加进“经济”一门，作为士人必修学问之一。在文风取向上，曾国藩以为姚鼐文章“惜少雄直之气、驱迈之势”，主张广泛吸取辞赋和骈俪之文的艺术特色，追求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。在行文之道上，他受到桐城派神气说的启发，讲求行气之妙，将行气和音节、字句、段落安排紧密联系起来，强调“因声求气”。可见湘乡派古文理论的基本观点大都从桐城派中来，并没有多少重大的实质性突破。然而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下，湘乡派作家如郭嵩焘、薛福成、黎庶昌、吴汝纶等，都有驻外或出国考察的经历，他们对西方文明都有较为切实的感受，文章中往往宣扬改良政治、变法图强、发展工商、兴办新学，这是桐城派前期古文中从未有过的；至于文章风格的遒劲恣肆、刚健挺拔，也与方、姚等人大相径庭，代表了道光以后桐城古文的新变。

两百多年前，姚鼐在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一文中提出：“为文章者，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。”承守与创变，是桐城派长盛不衰的秘诀，湘乡派之所以能光大古文传统，延续桐城文脉，原因正在于此。